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外国名著

超越国界的《浮士德》

■ 恩特格奇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赞许了《浮士德》作者歌德的非凡成就，还用书中经典角色墨菲斯托来比喻中国被偏见歪曲后的形象。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回忆了2014年3月出国访问时的一段往事：“在德国，我讲了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为什么要对外国人讲这些？习近平总书记说，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2016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一文还提到，习近平总书记曾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及一些德国汉学家共同交流阅读《浮士德》的感受。

在书中，浮士德本是倦于书斋生活的饱学博士，他与魔鬼墨菲斯托以灵魂为赌注订下契约，墨菲斯托将带领浮士德领略种种人生体验，而浮士德则笃信自己不会从中得到满足。借助墨菲斯托的魔法，浮士德与纯洁少女甘泪卿陷入恋情，得到御前为官的机会，还邂逅希腊古典美人海伦共育一子，只是这些经历都弄巧成拙惨淡收场。最终，不屈不挠的浮士德得到一片土地，开始填海造田的事业。浮士德在这一事业里体验到满足，发出

“停留一下吧，你多么美啊”的感叹，于是在赌约中落败。正当墨菲斯托得意地想夺走浮士德的灵魂时，天使们唱着“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将浮士德引上天堂，完成了对他的救赎。在剧中，浮士德升天入地、访古回今，挣扎于善恶仇恨之中，迷失在神魔生死之间，种种情节令人如痴如醉。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浮士德》的阅读难度，与这本书囊括的海量文化信息有关。浮士德的传说可追溯到15世纪，几百年间以民间文学等形式流传广泛。作者歌德则进一步将民间传说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经典。歌德不仅以诗文名传后世，在科学领域也成就斐然。他生活在18世纪中叶启蒙运动蓬勃浩荡的年代，到他去世之际，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种种成果也已深深地推进了人类历史；而《浮士德》的创作则贯穿歌德从风流少年到耄耋老人的漫长时光，歌德所经历的时代沧桑巨变无疑也投射到这部作品之中。同时，歌德把自己对日耳曼文化、古希腊神话、基督教精神的把握和思考融入书中，作品的深度、广度可想而知。

《浮士德》之所以难读，也在于它在思想上达到的高度需要人为之努力登攀。浮士德苦学知识、陷于爱情、步入仕途、寻访古典、追求事功，都是在积极探索生命的意义。浮士德将《圣经》中的“太初有道”改为“太初有为”，则表明了

他崇尚实践的立场。浮士德的精神是值得人们体悟的。此外，最终令浮士德感到满意的是“为几百万人开拓疆土”的填海造田工作。在这里，歌德也像马克思一样，认为“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浮士德》向我们抛出了生命意义的永恒问题，给出的答案也永远值得人们思索。

习近平总书记有意与德国友人谈及《浮士德》以沟通心灵，是因为《浮士德》是一部深入人心的作品。《浮士德》的影响是超越国界的：普希金、海涅、波德莱尔等文学巨匠曾以浮士德为素材另创新篇，瓦格纳、古诺、李斯特等乐坛大师为之迸发热情谱写乐章，画界妙手如德拉克罗瓦、达利也都曾从中撷取灵感绘就插画。《浮士德》也是雅俗共赏的，如“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等源于此书的箴言，也早已融入了国民教育、日常生活。德国乃至西方民众对于浮士德无疑更为熟悉，对他们而言，浮士德等书中经典人物已成为一个个标志性符号，常在流行文化中出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提到墨菲斯托也就自然会引发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国被描绘为当代“墨菲斯托”，也让德国听众明白中国所承受的被妖魔化的不公。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演讲时所批评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旧路，才是过去与今天真正的恶魔。这一点借

《浮士德》表达也很巧妙。德国另一位伟大文学家托马斯曾创作小说《浮士德博士》，其中的魔鬼影射的就是蛊惑德意志民族酿成浩劫的法西斯主义。过去，侵略与殖民确实加速了一些国家的短期崛起，但更长的历史则表明，无论这条邪路在一时间多么妖魅，与魔共舞之道不仅荼毒他人，也终将反噬自己。

《浮士德》能在德意志民族与世界人民之间搭起心灵沟通之桥，也在于其内涵的厚重。《浮士德》承载了德意志文化的诸多特点，也传递了歌德对一些人类终极问题的见解。提到德国，人们想到的更是康德的严密、马克思的深刻、贝多芬的激越，甚至还有俾斯麦的“铁血”、尼采的“疯癫”。《浮士德》中固然包含以上诸多元素，却又不乏浪漫与诙谐，打破人们对德国的刻板印象，让中国人民找到中德之间的更多共性。在遥远的中国，浮士德的精神也确曾启发郭沫若、宗白华、冯至等学人，推动他们对人生、民族的思考。这种深层共鸣的产生，则源于歌德颂扬的奋斗精神是人类共同财富。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各国人民的处境和命运千差万别，但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为改变命运的不屈奋斗是一致的，也最容易引起共鸣的”。《浮士德》借助对人类共性精神的探讨，将民族文艺上升为世界性语言，这对于中国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多元一体，在始终保持其统一性的同时，也具有多样性的地域特色。三晋、齐鲁和楚越三大文化圈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千百年来在保持鲜明地域特色的同时，不断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

地隔千里，血脉相牵。三晋文化圈核心区域位于黄河以北。齐鲁文化圈的核心区域是山东半岛。楚越文化圈的核心区域在长江以南的两湖和江浙地区。三个文化圈分处天南地北，远隔千里，即便在今天看来，其地域文化也迥然有别。但血浓于水，三个文化圈的核心都是周王室分封姬姓和功臣的诸侯国，血脉上的联系和宗法上的地位使得三大文化圈从产生之初就存在相互融合的亲和力。

三晋文化圈的晋国出自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名燬，改国名为晋，是为晋侯。邑姜据传是齐太公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的妻子，叔虞的母亲。齐鲁文化圈中的鲁国也是姬姓诸侯国，出自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齐国则出自太公吕尚姜子牙，是叔虞的外祖。楚越文化圈中的吴国虽然远在长江以南，但也是姬姓诸侯。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二人为了避位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周文王的父亲季历，远避荆蛮之地，自称句吴，得到当地部落的支持，建立吴国。后武王将太伯、仲雍后人周章封于吴国。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周北边的虞国。楚国初代国君熊绎是周成王的大臣，芈姓，封于楚蛮。其先祖出自黄帝之孙，帝颛顼高阳，也是源自姬姓。而越国的先祖是大禹的后裔，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同是华夏苗裔。

太史公司马迁曾感叹：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虽然血缘相近并没有阻止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间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攻伐，甚至不乏兄弟阋墙和父子相杀的例子，同是姬姓诸侯的虞国就是被晋国所灭。但共同的血脉确实拉近了在地理上山水阻隔的各个文化圈之间

春秋战国时期三大文化圈的融合

□ 包振宇

的心理距离，使得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成为可能。中华文化自古讲究夷夏之辨，以华夏文化为先进，鄙视四边之蛮夷。《尚书·禹贡》根据距离黄河流域文化和政治中心的距离远近将天下分为“五服”：五百里“甸服”，即王畿；五百里“侯服”，即诸侯领地；五百里“绥服”，指已经靖地区，即中华文化所及的边境地区；五百里“要服”，即结盟的外族地区；五百里“荒服”，即未开化地区。在地理上，三晋处于“五服”的核心地带，而齐鲁位于“东夷”，楚越更是地居“南蛮”，断发纹身，已处于“五服”的边缘。但齐鲁吴楚等诸侯国在血缘和宗法上的联系，让齐鲁文化、楚越文化和三晋文化都具有华夏文化的身份认同，从而具备了彼此交流融合的对等地位。如果说在齐鲁夹谷之会上，孔丘以演奏夷人莱国的音乐不合礼制而斩杀人体现了在文化上“鄙夷”的态度，《左传》中季札观乐的记载则表明“荆蛮句吴”已经有和近服诸侯在文化上平等交流的工资。

位居诸侯，胸怀天下。三大文化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形成、发展和融合还和圈内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齐鲁晋楚赵吴等国虽然都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但都不满足于封建割据、偏安一方，而是胸怀争霸天下的雄心，积极开展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先后成为霸主。如果以完成诸侯会盟作为称霸的标志，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楚庄王、晋景公、晋

悼公、晋定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来自三大文化圈的诸侯都曾成为一时的霸主。他们的霸业奠定了三大文化圈在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地位和势力范围，争霸战争客观上也促进了不同文化圈之间文化的交融。

三晋文化圈中的晋国在春秋时期称霸时间最长，维持了百年之久的霸业。公元前633年，楚成王伐宋国。次年春，晋文公与齐国和秦国结盟，在城濮之战中打败楚军，在践土会盟中被周襄王册封为侯伯。晋国在文公称霸后又先后经历了襄公续霸、景公复霸，其霸业在悼公（前573—前558年在位）时达到顶峰，独霸中原，成为绝对的天下霸主。晋国称霸在文化上影响十分深远。虽然晋国最终被三分，但三晋之名却沿用千古，足见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齐鲁文化圈中的齐国是周王室股肱大臣太公吕尚封国，周成王时被赋予征伐之权。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任用管仲为相，首倡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鲁国是周公封国，“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其在诸侯中地位很高，有“鲁之班长”之说。虽然鲁国未曾称霸，但也积极参与诸侯国间的争霸活动。

楚越文化圈中的楚国先后与齐国和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在郢（今河南郑州）大败晋军，成为霸主，一度问鼎中原。吴国，虽然僻居荆蛮之地，但自谢闾室之长，常怀

霸中国以全周室的志向。吴王夫差在艾陵之战中击败齐国后，于公元前482年在黄池会盟诸侯，完成霸业。楚越文化圈中的越国，其俗断发文身，但也积极参加诸侯争霸。越王勾践在被吴国击败后，卧薪尝胆，灭吴后乘势北进，与齐晋诸侯在徐州会盟，成为春秋末年最后一位霸主。

在孟子看来，春秋无义战。但诸侯的争霸活动大都以尊勤王室，攘斥外夷为名。注重夷夏观念的民族意识和追求统一的政治传统强化了华夏文化的向心力。而诸侯在争霸过程中频繁的外交、战争和会盟活动，也让地域文化在激烈的碰撞中实现了跨圈的交流 and 融合。

货殖之利，贸易有无。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化圈之间的跨区域贸易，为地域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在完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条件下，“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地域间的文化交流较难推进。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批判了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指出“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推行重商政策，鼓励贸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满足本地区人民生活生活的需要。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五条盟约中有两条关乎跨国贸易：“敬老慈幼，无

（上接1版）我们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促进各族群众从全面小康向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确保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掉队。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强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科技帮扶，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努力让脱贫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二是实施就近就地就业行动、“技能云南”行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多渠道做好就业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方便更充分的就业。三是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质量和效益实现大的突破，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四是持续推进健康云南建设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水平提升，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努力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五是完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坚持制度自信，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云南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边境线长，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同边境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织，巩固好民族团结、维护好边疆稳固，是我们的重大政治责任。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凝心铸魂，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云南各族群众的故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二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依法管理宗教事务，高质量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三是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慎终如始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严防输出”，打好第五轮禁毒和防艾人民战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云南、法治云南。四是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加快边境地区口岸城市、中心集镇建设，优先打造374个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实现边民富、

边关美、边防固。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云南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更高标准、更严格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七彩云南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良田沃土。一是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创建高黎贡山、亚洲象等国家公园，协助办好COP15第二阶段会议，配合做好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成立和运营工作。二是全面开展生态保护治理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三是全面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湖泊革命”，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四是全面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建立完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一是把政治生态净化好。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扬正气、树新风，引领推动全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风清气正。二是把干事创业环境营造好。全面提振各级干部的精气神，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一线考察干部，奖优罚劣，谁干事就支持谁，谁干成事就重用谁，建设一支敢于担当、干事创业的干部队伍。三是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深化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分类指导农村、城市、机关、国有企业、学校、公立医院、“两新”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分领域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创特色、出实效、上水平，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四是把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的工作理念树立好。牢固树立“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效率意识，大力推行项目工作法、一线工作法、典型引路法，坚持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具体化，让每项工作都实起来落下去，让“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成为云南广大党员干部的鲜明特质。

“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它不仅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也极大促进了城市和交通的发展，大大加强了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

河之大者，通运南北。中国地域广大，山川险要。不同文化圈之间山水相隔，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但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障碍。三晋、齐鲁和楚越三大文化圈纵贯我国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四大流域，这些河流又都是东西走向。这就使得南北交通不仅无法享受舟楫之利，反而受制于江河天堑，仅凭陆路无法通达。人工开凿的运河就成为重要的交通孔道。

《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郢，沟通江、淮。”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与齐国争霸，修筑郢城（今江苏扬州蜀冈附近），又在郢城之下开凿邗沟，并利用射阳湖等天然湖泊，沟通了长江、淮河。这是我国最早见于明确文献记载的运河。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为了乘舟到黄池与晋国会盟，又在商鲁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据《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战国时期，魏国又重新修凿深沟。两段运河贯通江淮济四渎，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南北交通的干线。运河的开凿便利了交通往来，促进了沿线区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范蠡经商的陶就位于深沟和济水的交汇处，成为战国时期的一大经济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开凿的运河很多。《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了鸿沟、楚运河、吴运河、齐运河、蜀运河。这些运河形成的水路网络为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交通便利。对于邗沟是不是中国最早的运河，学界不乏争议。在三大文化圈内部，不乏开凿年代更早的城市运河和地方运河。但以邗沟为原点的大运河，所以称为大者，正在于其推动了三晋、齐鲁和楚越三大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通，促进了中华文化和融合。